

一 烦恼让你无处可逃

学者们认为，生活质量包括人们的生活环境是否清静美好，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设施、生活服务、社会风尚乃至社会治安等社会条件是否良好完备，个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的高低，等等。人们对生活质量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从主体体验角度来讲，比较高的生活质量应该使人对生活有一种比较强的幸福感和比较高的满意度。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烦恼之中，我们很难认为这个人有比较高的生活质量。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人，社会生活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改善，他们在充分享受着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烦恼。你不一定碰上这些烦恼的全部，但你很难逃脱这些烦恼中的一种。

1. 三百六十行，哪行能轻松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说的是你无论从事哪种行当，只要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你就一定能干出名堂来。可是在激烈竞争的今天，姑且不说就业之艰难，即使有了一份职业，你也会处于持续的高压之下。大量的信息告诉我们，不同职业的人有着不同的压力和烦恼，所

谓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三百六十行，哪行能轻松？

俗话说，世上三行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可是当你读到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对中国农民的调查后，你就会感到，今天的中国农民真苦。两位作者深入八皖大地做了大量实地考察，结果看到了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他们在黄山市休宁县白际乡发现，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 700 元 月收入仅摊到 58 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 620 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 514 户 达到 82.9% 全乡 2 180 人，贫困人口占到 1 780 人，达到 81%。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还得承担各种苛捐杂税。他们还发现，一些地区的村官乡霸已经蜕变成黑恶势力，他们横行乡里、欺上压下、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乃至草菅人命。当然，两位作者披露的这些情况并不普遍存在，但农民比较贫苦，农村比较贫穷，农业发展比较缓慢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历史上看，脱胎于落后的生产力和凝固的生产关系的中国农村一直处在非常贫苦的低收入水平上，那是一种普遍的贫困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全新发展面貌让许多农民告别了落后与贫困，但贫困仍然广泛存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收入在总体上不断增加。但随着改革的重点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农民的相对贫困、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日益突出 形成了所谓的“三农”问题。

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区域性贫困。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黄土丘陵沟壑区、东西部接壤山区、西南

喀斯特山区、东部丘陵山区、蒙新干旱地区、内蒙古高原沙化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等。现有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干旱区、水库区、地方病高发区和边境地区。独特的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成为落后生产力的主要原因。这些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

除了区域性因素外，制度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从根本上讲，农村的普遍贫困状况与城乡二元的分割制度有关。在这项制度下，农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少。另一方面，工农业剪刀差剥夺了农民的利益。与此同时，许多农民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缺乏发言权，难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从制度设计上，减少对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制度歧视非常必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 亿人口就有 9 亿农民。9 亿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难道对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吗？

我们再把视角转向城市。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活载体，里面生活着形形色色的群体，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但大部分城市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是各类企业的职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贫困人群。

传统意义上的城镇贫困人口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救助对象，即“三无”人员：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孤老幼残。据民政部门统计，“三无”人员约为 100 万左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导致城市涌现大批新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失业、下岗无业、困难企业的职工以及离退休职工中的困难人员。企业职工成为新增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

一般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该在 1 500 万至 3 100 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 4%—8%。总体而

言，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总量较大，并且稳定在一定的规模。

城镇贫困人群呈现明显的行业和地区分布特征。从行业上看，城镇贫困人群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支柱产业，如钢铁、纺织、机械和建筑等。以上行业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以及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背景下，大量职工被精简下岗，职工工资拖欠严重，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医药费得不到保障。从区域分布上看，城镇贫困人群主要集中于中西部落后及欠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以及产业结构明显单一且对资源有着强烈依赖的城市、以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小城市。贫困地区的分布特征实际上归因于其行业分布特征，因为上述城市的经济体系都是主要依靠传统支柱产业。

城市贫困程度非常严重。城市贫困居民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这主要表现为：收入低下、恩格尔系数高、消费水平偏低、家庭债务偏高，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处于不利地位。有些研究显示，从 1988 年至 1995 年，城市贫困居民的食物热量供给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贫困发生率从 1988 年的 4.29% 上升到 1995 年的 11.25%。这说明贫困程度在加深。

收入差距扩大是城市贫困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全面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7 年 20% 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 3.1 倍，1998 年扩大为 3.3 倍；1997 年城镇居民 10% 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 10% 最低收入户的 4.2 倍，1998 年扩大为 4.4 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 1984 年的 0.30 上升到 1998 年的 0.403。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在逐步拉大。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高收入的阶层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低收入人群的扩大。

就业状况与城镇贫困是紧密相连的。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取决于就业状况，内退、下岗、失业、单位效益不好等因素都会严重影响其收入来源。失业和下岗是城镇居民坠入

贫困的最重要风险因素。最近几年，失业、下岗人数激增，失业保险金、下岗职工生活保障金显然难以满足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失业、下岗人员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找到工作，他们成为贫困居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许多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职工因为单位效益不好或亏损，工资多年不增甚至下降，本来较低的工资有时还不能按时发放，收入很低，徘徊在贫困的边缘。

城市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工资，因此，工作对城市居民的收入来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仍然在岗的城市居民来说，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如何呢？有人对安徽省芜湖市的居民进行调查后发现，由于城市的不断发展，竞争日益激烈，被调查者对工作的满意度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满意和不满都占有较大的比例。对自己目前所从事职业的满意度，处于中间水平的只占 7.9%，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占 44.8%。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则占到 43.3%。这个比例涵盖了各个阶层，如果仅以企业职工为调查对象，可以合理地推出，不满的比例会更高。

企业职工不仅是新增城镇贫困人群的主体，而且他们原来的主人翁感正在日益消失。由于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仅厂长（经理）的收入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的差距拉得过大，而且不少厂长（经理）实际上独断专权，职工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管理者与普通职工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由此可见，城镇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部分职工的生活质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提高全体职工的生活质量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做出很大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企进军中国。一般而言，外企的管理机制、管理水平、生产力水平、竞争能力、市场占有率好于国内企业，其职员的薪金报酬也好于国内企业。因此，进

入外企发展是许多人特别是白领一族所追求的事情，不菲的薪金、舒适的办公环境、便利快捷的工作方式、频繁的交际活动……在一般人看来，外企白领就意味着“物质生活满足，精神品质提高”。那么，外企人的状况或者说生活质量究竟如何呢？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和中国对外服务杂志社曾联合开展了一次“外企人职业生活质量调查”。

调查表明，寻求个人发展几乎是所有外企人进入外企的目标，96.9%的被调查者认为个人的发展极为重要。对于工作本身，多数外企人表示值得肯定，能实现个人价值。近半数被调查者声称喜欢自己从事的职业，超过九成的人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非常重要，还有78%的被调查者肯定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从个人发展角度看，被调查者中有74.2%的人认为外企工作有助于个人事业的发展，完全否定者仅占6%，认为工作具有挑战性的人占59.8%。

希望获得高报酬是外企人的另一个主要愿望，96.8%的人看重薪酬水平。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薪酬马马虎虎，92.6%的被调查者基本满意自己现有的薪酬水平，仅有3.1%的人对自己现有的薪酬水平极不满意，但非常满意者也仅占2.1%。

好的工作氛围是外企人的又一希望。调查结果显示，外企工作氛围办公环境普遍较好。72.2%的被调查者对其工作环境与办公条件表示满意，多数人虽然与上司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相处也还融洽。多数外企人与同事都能和睦相处，甚至还能有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虽然有40.2%的人认为外企内部人际关系复杂，但并没有太多的人认为外企内部人际关系紧张。在不少外企人眼中，外企是个民主组织，员工参与决策的机会较多，且存在鼓励个人发表自己见解的氛围。

但是，外企的白领们就没有压力，没有烦恼吗？回答是否定的。

外企工作固然能挣得相对丰厚的薪酬，但外企工作更为辛苦，工作压力也相对更大。从调查结果来看，有许多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工作时间过长，66%的人认为最合适的工作时间为每周 40 小时，而工作时间超过 40 小时的员工占 77.3%，更有 19.6%的人每周工作时间甚至在 48 小时以上。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外企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工作忙碌而紧张，下班后疲惫不堪。被调查的某外企人事主管张先生说，每当我和朋友们一同逛大街或吃饭时，朋友们都会认为他们花钱也像我如此这般潇洒自在的话就好了。而我只能在心中暗叹：如果真有机会让你来做我现在的工作，你们真的会愿意吗？当我还在公司加班时，很多人都已经在家与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当很多人还在睡梦中时，我已经匆匆地赶往公司去开电话会议了。每个休息日，当许多朋友自由自在地尽情享受时，我还得把工作带回家来接着做。不在其位，不知其艰辛，一旦身在其位，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和家人才能知道。

同时，对于希望有晋升机会的人来说，外企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有 78.4%的外企人希望得到晋升机会，而有良好晋升机会的只有 7.2%，21.6% 的被调查者根本就没有任何晋升机会。不仅如此，还有 33%的人担忧现有的工作不能稳定。被调查的某外企部门经理吴小姐说，我做到今天这个位置花了 10 年时间。在外企生存，总体的感觉就是“高处不胜寒”。其实，生存是需要讲究技巧的，而晋升更不像名片上增加一个头衔那般轻巧。即使你今天能拿到 20 万的年薪和得到相应的头衔，那么明天呢？即使不奢望自己年年都能百尺竿头，但是看到后辈们都那么努力，自己稍有松懈，目前的职位就有可能难保。

可见，工作中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担忧，使得外企人的生活精彩也很无奈。

外企白领不过是白领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整个都市白领一族的生活也基本上都是既精彩也无奈。2004 年举行的中国公共卫生发展论坛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提醒，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以及工作节奏的加快，有 5 种新的疾病综合征正侵袭现代都市白领，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

一是光源综合征。许多人在办公时习惯把灯打开，把整个室内照得亮亮的，殊不知灯光也会给人带来伤害。人在灯光下，时间一长就会造成视神经疲劳，且灯光缺乏阳光下的紫外线，使缺钙所致的老年性骨折、婴幼儿佝偻病不断增多。还有专家认为，荧光灯发出的强烈光波，会导致生物体内大量的细胞遗传变性，无形中扰乱了生物钟，造成人体心理节律失调，精神不振。

二是夜餐综合征。夜晚支配胃肠道功能的副交感神经活动较白天强，胃肠道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也强，因而夜生活中，经常进食过多的高热量食品，容易引起肥胖、失眠、记忆力衰退、晨起不思饮食等症状，并容易诱发神经衰弱、高血压、溃疡病等。

三是熬夜综合征。城市夜生活的丰富多彩，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夜生活的行列，使一部分人逐渐开始形成了晚睡觉的习惯，长此以往，会导致人体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紊乱，继而出现食欲不振、失眠等症状。

四是盒饭综合征。工作节奏的加快，使都市白领越来越多地依赖盒饭。但盒饭加工缺乏卫生条件，盒饭成分缺乏必备营养，加工者常常使用浓重的调味品。经常食用这种盒饭容易上火，出现咽痛、口腔溃疡、牙痛、腹胀、便秘等症状。另外对一些不新鲜的肉类多采用炸、煎，长期食用容易患肠胃

不调疾病。

五是时间综合征。它是指人们对时间的反应过于关注而产生的情绪波动、生理变化现象。时下，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都市白领感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对事业的专注使人对紧迫的时间感到焦躁不安、紧张过度，这样会引发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呼吸急促等症状。

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状态又如何呢？

公务员被认为是最稳定的职业之一，特别是近几年公务员不断加薪，加上手中又有些职权，使得许多人对这种职业十分向往。但是这几年机关不断精简，再加上普遍实行末位淘汰制，人人都得小心翼翼。至于升迁机会，更是僧多粥少。

教师和研究人员，由于属于知识分子的行列，这几年的待遇又不断提升，也是人们羡慕的对象。但是，职称评定、论文写作、项目研究……那一样不牵动他们的神经末梢？近几年，媒体上连连报道大学名师剽窃的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

还有民营企业家，似乎个个都是肥得流油的大款，但真正成功的毕竟是少数，而且这些少数的成功者，个个都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商场拼杀的腥风血雨。多数民营企业主们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风雨飘摇，沉浮不定。至于数不清的个体户们，或是吃尽辛苦，换得经济上的比较宽裕，或是苦苦挣扎勉强维持生计。

当然，各个行业的人们的烦恼的性质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各个行业的人们的从业人数和社会地位也是不一样的。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都存在着压力和烦恼却是一样的。而且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其次是企业职工，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容乐观，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不容乐观。

2. 你安居了没有

所谓好的生活质量，通俗地说，也可以称作安居乐业。前面叙述了社会中主要行业的人们特别是农民和职工的职业状况，这里主要叙述一下人们的居住状况。居住条件是生活质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们分析生活质量时所不可忽略的。

《中国生活质量：现状与评价》一书对中国人的居住条件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数据分析，并对各个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这里做一些摘录：

全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总的来说呈递增趋势，从 1996 年的 8.47 平方米到 1997 的 8.83 平方米，再到 1998 年的 9.30 平方米。

1996 年各地区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排名情况是，西藏、浙江、海南遥遥领先，分别是 17.43 平方米，12.68 平方米和 10.74 平方米，都在 10 平方米以上。福建、山东、北京、广东、江苏、湖北、云南、上海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也比较大，都大于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全国平均数 8.47 平方米。河北、四川、山西、江西、新疆、湖南、宁夏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居中，处于 8—8.45 平方米之间。广西、贵州、天津、内蒙古、河南、辽宁、陕西、甘肃、黑龙江、安徽、吉林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相对来说偏小，不到 8 平方米。青海居于最末，只有 5.51 平方米。

从数字可以看出，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直接对应关系。因为天津等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它们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却排在后面。西藏的社会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但其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却高居榜首。这是因为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与人口数量及城镇地域面积关系更加密切。

人均居住面积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表明，住房满意度与家庭生活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人均居住面积大小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无疑人均居住面积大的家庭在居住生活质量上要高一些。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比城镇要大很多，但住房质量、室内装修状况、水电煤气的方便程度以及厨房卫生间的设置标准与城镇都大不相同，因而决不能简单地认为农村居住生活质量比城镇高。

总的来说，1996—1998年间，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在上升，表明农民的居住生活质量在不断地提高。从各个地区的比较来看，上海、浙江、江苏这三个地区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排在最前面，这显然与这些农村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早最快的沿海农村地区。湖南、北京、湖北、江西、四川、福建、广东、山东和重庆等省市的农村人均居住面积都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属于居住条件较好的地区。河北、天津、辽宁、河南、云南、广西、安徽、海南、陕西等地区的农村居住面积居中，都处于 18—23 平方米之间。山西、黑龙江、吉林、贵州、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甘肃、青海等地的农村人均居住面积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其中最小的是青海。

将城镇和农村结合起来看，浙江是城乡居住条件既同步发展又位居全国首位的地区。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的是青海。天津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住面积的增长速度都在下降。从地域来看，沿海地区如福建、山东、江苏、广东的居住生活质量比较高，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贵州、内蒙古、甘肃、青海地区等省的居住条件都排在后面。

我们大量引用了上面的统计数据 and 比较分析，为的是让读者有个总的印象，就是中国人的人均居住面积在不断地增加，居住方面的生活质量在总体上是不断提高的。但是，数

字有时能说明问题，有时又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就住房面积而言，有两点应该予以考虑：一是人均居住面积的意义只有考虑到社会的贫富差距时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如前所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近几年有所上升，说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就这一点而言，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居住方面生活质量的提高。二是住房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生活用品。如前所说，中国农村的人均居住面积大大高于城镇，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农村在住房方面的生活质量高于城镇。因为住房必须考虑到房子的质量、室内的装修状况、煤电气设备和厨房卫生间方面的设施情况。中国农村特别是落后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破房危房，这样的住房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此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土墙茅顶式的房屋，这样的住房低矮潮湿，通风通光的条件极差，实际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住房。

考虑到上述两点，中国人在居住方面的生活质量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曾对天津市区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问卷调查，居住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人均居住面积为 11.85 平方米。其中，5 平方米以下的占 7.2%，6—10 平方米的占 43.7%，11—15 平方米的占 32.0%，16—20 平方米的占 11.0%，20 平方米以上的占 5.4%。调查者最后得出结论说，按照国家有关小康生活质量中人均居住使用面积 10 平方米的标准，天津市目前已有较多的城市居民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调查者所得到的数据和结论，但我们有两点思考，一是 6—10 平方米这一档的调查数据域设置得过宽，因为 10 平方米是一个度，6 平方米以上、10 平方米以下的究竟是多少？二是较多居民在住房方面达到了小康生活质量标准，这个较多按照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充其量不过是略多于 50%。这样看来，天津市区居民在住房方面的

生活质量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

易国松和风笑天对武汉市居民居住条件进行调查以后认为,在现代城市中,人们对家庭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住房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和需求层次提高的要求,城市住房问题普遍比较突出。就武汉市而言,有 $1/3$ 的居民觉得住房拥挤,有将近 40% 的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住房困难。居住是影响人们告辞和方便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衣、食、住、行生活中,居住是现代城市居民家庭最为关心的资源条件,是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最重要的因素。

有人对安徽省芜湖市居民的住房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芜湖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到 1998 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 7.14 平方米,比 1958 年的 3.5 平方米增长了 1.4 倍。调查发现,76.5% 的居民住进了单元住宅楼,有自家独用厨房的占 66.8%,有自家独用厕所的占 64.4%,有自家独用自来水的占 60.2%,有 23.5% 的居民还住着筒子楼、平杂房和其他老式房子,有 22.5% 的家庭共用厨房或用楼梯口、过道口作厨房。调查中还发现,有 33.2% 的居民家庭存在着“10 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有的床晚上架起白天拆掉”、“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客厅里也架起了睡觉的床”等困难情况,有 53.8% 的居民认为自家住房状况一般,有 28.5% 的居民觉得自家的住房比较拥挤或很拥挤。

上述的一系列调查数据都是几年前的数据,这几年房地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肆进行旧房拆迁和老城区的改造,一方面拉动 GDP 的增长,将自己的政绩数字化,另一方面,通过大量批租土地,获得高额租金来充盈地方财政。住房的巨大市场需求则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狂热投资,使得房地产业购销两旺,房地产市场出现火爆的局面。这至少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上升较快,二是房价疯狂攀升。

中国城镇的住房制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以前长期实行的福利分房制度，住房一直十分紧张，机关和企业、行业和行业之间的住房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然后逐步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补贴和商品化。原先拥有住房的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得到了房改房，效益好的单位或是突击建房或是购买商品房的，以后以房改房的身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归个人所有。而许多效益和福利比较差的单位特别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可改之房甚少乃至根本无房可改。这就造成了改革过程中的第一个不平等。

随着住房商品化的全面推开，原先住房条件极其简陋甚至根本没有住房的人以及新参加工作的人，只有通过市场去购买商品房。购房时，国家有政策规定，对符合不同条件的人，单位要支付一定的补贴。对效益好的单位，购房补贴不仅能及时得到支付，而且会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而对效益差的单位，购房补贴不仅不能及时支付，对大部分职工而言，只是个可以充饥的画饼。这就造成了有些人不仅有了“一房”，甚至有了“二房”、“三房”，而有些人连“一房”都无望。这就造成了改革中的第二个不平等。

全国大部分城镇的房地产市场呈现给我们的购销两旺的喜人局面。可是当我们透过繁华的表象，你可以看到隐藏在背后的一丝忧虑。

以近期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为例，据调查，2004年，南京城区五板块单价承受能力最强的区间是4 001—5 000元/平方米，其次是5 001—6 000元/平方米单价段。平均超过6 000元/平方米的住宅仅有5.3%的潜在购房者愿意承受。而据最新统计数据，2004年4月南京城区五大板块的销售平均价格分别为：城东4 568元/平方米、河西5 289元/平方米、城中5 623元/平方米、城北4 027元/平方米、城南

4 301元 / 平方米。过去由于交通、生活配套等因素的制约 部分区域的价格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今地铁等市政配套的重大变革，颠覆了曾经存在的地段因素，价格上升在所难免。而同期的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何呢？据 2004 年 7 月 19 日南京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数据，2004 年上半年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 839.32 元，同比增长 13.7%。据介绍，构成居民家庭收入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就业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和养老金的增长。我们撇开增长的主要原因，以三口之家计算，每个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为 35 035.92 元，可以想像出，在南京，一个家庭想购一套住房，得需要多少年的积蓄？如果一个家庭是低收入户，它还有能力去购买商品房吗？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增长，但同期的物价也在上涨，而城市的房价更在狂涨。据媒体报道，南京市 2004 年第二季度房价上涨幅度达 16.2%。

那么购房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炒房一族，他们是投机性行为，只能给市场造成负面效果，因此，有许多城市开始设置防线；二是富有一族，他们带有投资性质，据专家说，投资性住房需求对社会有益无害；三是单位效益非常好的人，这些人由于有单位的丰厚补贴，对购房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四是薪金收益尚可的人，这部分人购房时多搞按揭，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至于为数不少的低收入者，看着涨到了天的房价，大概只能望楼兴叹。

富有的人总是少数，工薪一族购房而不做贷款的人恐怕是极少数，而工薪一族是城市居民的主体。购房而做了高额贷款，居住方面的生活质量是大大提高了，可你得在沉重的还贷包袱的压力之下生活，你的精神方面的生活质量会怎样呢？你真的安居了吗？

3. 有教无类，但得有钱

教育水平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和构成要素之一。教育水平本身作为评估和衡量生活质量水平的重要尺度，在生活质量的测定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没有或者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在现代社会中几乎很少有发展的机会，其生活质量不可能是高水平的。教育对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我们今天的教育状况究竟怎样？作为个人，我们在教育方面有没有烦恼？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教育整体状况。

有统计资料显示，1997 年，全国各地的平均在校率为 43.38%，这里的在校率是指 6—24 岁人口中正在各级各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口比重。这个百分比表明，中国政府和社会能够提供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教育发展的社会供给严重不足。这种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全国各个地区的分布极不平衡，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省市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排在第一位的是北京，在校率达到 64.63%，排在最后一位的是西藏，在校率只有 30.20%，第一位与最后一位的差距高达一倍之多。除了地区差别外，城乡差别也十分严重。

1997 年，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7.009 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地区是北京市，为 9.501 年，最低的地区是西藏，为 3.50 年，两者的差距为 6.001 年。此后的两年中，全国人均受教育的年限稳步增长，1998 年为 7.09 年/人，1999 年为 7.15 年/人，表明中国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社会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根据联合国开发署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测算，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排位高于经济发展在世界上的排位，世界平

均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为 5.2 年 / 人，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0 年，发展中国家为 3 年，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高发展水平的为 7.0 年 中等发展水平的为 4.8 年 低发展水平的为 2.0 年。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总体上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中等偏上水平。

1997 年，中国高中阶段的入学率为 14.81%，1998 年上升到 24.31%，1999 年上升到 26.75 表明中国高中阶段的教育正在稳步增长。这三年中，绝大部分地区的高中阶段的入学率都有所上升，尤其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的高中阶段的入学升学率上升得更为迅速，每年的增长幅度高达十几、二十几个百分点。但也有少数地区如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出现了高中阶段入学率下降的趋势。

1997 年，中国适龄青年中仅有 4.84% 的普通高校在校学生，1998 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为 5.81%。尽管近几年推行高校扩招政策，但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上升幅度并不大。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布局方面很不平衡，地区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差距高达几十倍，其中大部分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18% 的入学率。

1999 年 中国青壮年文盲率为 15.4%，15 岁及以上年龄的文盲、半文盲人口为 14 346 万，其中，城市常住人口占 10.3%，其余大部分属于农村人口范畴。全国各地区的文盲率也有很大的悬殊，最低的北京市仅为 6.45%，最高的西藏则高达 66.18%。

上述一系列数据说明，中国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分布又极不平衡。普遍初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教育经费不足是困扰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教育投资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困难的限制而长期投入不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 年的统计资料表明，1995 年世